

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

韩启德著作入选2022年度十大科普作品



《医学的温度》

文宗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原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所著《医学的温度》入选“典赞·2022科普中国”十大科普作品。

3月26日，“典赞·2022科普中国”揭晓盛典特别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现场揭晓2022年度十大科普人物、十大科普作品、十大科普事件和十大科学辟谣榜。“典赞·科普中国”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牵头主办的一项评选活动，始于2015年，到今年已连续举办八届，通过盘点年度科普的人物、作品、事件和谣言，在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科普领域影响力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品牌活动之一。

“典赞·2022科普中国”对《医学的温度》一书给出的评语是：作品以“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为主题，阐述了对癌症、传染病等的独特见解，重新审视全速发展的现代医学技术及其方向，倡导发扬医学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

在《医学的温度》一书的开篇，韩启德讲述了他10岁时生的一场病：他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了一家小医院。三天后，他被救了过来。治疗其实并不复杂，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但护理却绝对周到——护士把饭喂到我嘴里，一有空就轮流来给他讲故事。“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颗大松树。”韩启德写道，“哦，医学是有温度的。”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但至今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疾病的根本危害在于伤痛，伤痛是一种主观感受，病人需要疗愈，也需要关爱和照顾。医生要治病，也要治心。”韩启德在书中写道，“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除作为代序的《医学的温度》一文外，书中还收录了《医学是什么》《传染病的历史告诉我们》《始于医者仁心的叙事医学》等18篇文章和作为附录的《幸福就是为别人做事》。全书以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下韩启德作为患者、医生、导师等不同角色下充满温情温度的医学故事，以及对于疾病、生命、科技、幸福等与医学有关话题的深度思索。

“现在有的医生看病头都不抬，问病人一句哪里不舒服，就开出一大堆化验单，让查完再来看，病人能满意吗？”韩启德在书中指出，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教科书上描述的一种种病。他在书中对现代医学进行反思，提出医学具有科学属性、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认为后者尤其不应被忽略。

《医学的温度》一书一经出版，即引发广大医务工作者乃至社会各界对现代医学和医学人文的深入思考，被评为2020年度中国好书，入选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科普图书类特别奖。2021年1月23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读书》栏目曾向广大观众和读者推荐了《医学的温度》一书，称其是“一本直击当代医学诸多难题的‘大家小书’”。

充分借鉴孔子的成德之教

杨朝明

万仞宫墙，只有“得其门而入”，才能见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同样需要把握关键。《孔子家语·弟子行》载：“夫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孔子教人成德，为政以德，这给今天我们思考政德教育问题以很好的启示。

孔子的成德之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爱与敬为“至德要道”，孔子教人就是从《诗》《书》等“先王政典”出发，以孝悌之道培养“爱与敬”的情感，让人安心于仁义之道，倾情于礼乐精神。细细品味，孔子施教体系的中心其实就在于正其心、诚其意、思无邪，都围绕“正”这个核心而展开。人们在思考社会管理之道时，思考怎样才能人心和顺、社会和谐，于是有的徘徊于东方、西方之际，有的纠结于德政、法治之间。孔子给出的方法可谓简单明了，“政者，正也”，“为政”就是“为正”，“为正”就是思考人心之正、社会之正，为政者正才能引导社会的正。有一次，鲁哀公问政，孔子说：“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又有一次，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无论国君还是大臣，都应发挥表率作用，都要尽力做到“其身正”。

古代“大学”是“大人之学”，大学培养有格局、有情怀、有担当、有境界的社会管理者，“大学之道”使人们格物明理、正心诚意。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明孝仁礼

义”，用以导习世风；同时还要“逐去邪人”，使人不见恶行。《大戴礼记》载：“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当社会上明德向善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就“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就有了良善的社会风气、美好的社会政治。

为政者重视教育，是因为它对于人心之“正”的关键意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知识就是力量，力量需要方向，有了人心之正，才智才会发挥积极作用。传统教育格外注重“养正”和“正心”，古时候，人到15岁，贵族子弟及民之俊秀者，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修身，不就是“正其心”的功夫吗？《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中庸》说“道前定而不穷”，说的都是方向问题，也都属于“正”的要求，属于“一”的要求。孔子的“正名”主张就是希望人们知止守正，希望人能明其分，尽其力。《大学》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为政”或者“为正”，其实是对每一位有格局的人的要求。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有其位者自当谋其位之政；而没有官位的人亦当思考如何以正导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当今社会，每个人都应自觉提高自身素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正确的方向，有益于人民的幸福、有益于民族的复兴。

政德教育要从受教育者主体出发，关

注为政者个体的成长。孔子施教“道之以德”，也启示政德教育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而道德建设要找到关键、抓住根本，让爱与敬在人们心中扎根。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中国社会特别重视家庭，因此，家庭教育对人的成长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中国的传统思维就是家国一体、家国相通。无论是谁，都首先属于自己的家庭，人在家庭中所熏陶形成的价值认知、行为习惯，必然在工作岗位上、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从而形成社会的风尚。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就要在全社会形成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中国文化的实质在弘道明德，传统文化追求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希望把人培养成为有爱心、有情怀、有担当、爱学习、求上进的君子，因而要求人们讲信修睦，自觉修身，克己推己，换位思考。君子人格培养恰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

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伦理的基本要素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正能量、主旋律。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在他看来，君子之道、人的廉耻感，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除

此之外，别无其他。

中国古代特别强调学以成人，倡导学成大人，也是鼓励人们追求更高的格局与境界。在孔子心目中，人可以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王阳明认为人生“第一等事是读书做圣贤”，曾国藩的老师唐鉴曾送给学生一句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听起来不免惊异，其实这里的“为”字是动词，意思是人努力地朝向圣贤努力，而不是自甘沉沦、甘于平庸。早期儒家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人禽之辨”，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努力地走向更高层次的格局。

在古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君臣关系是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父子关系是基本的血缘亲情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君子”把与“臣”相对的“君”、与“父”相对的“子”统一起来，表示的是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一致性。曾子讲“大孝尊亲，其次弗辱”，意思是，人最大的孝是“使亲尊”，意味着父母孩子要追求社会价值的认同；人之为，如果不辱没父母的名声，就要使自己成为“有教养”的人，同样意味着家庭美德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为政之德的高度统一。

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以明德引领风尚，就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从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培育大人君子们的使命担当，使之拥有坦荡仁和的博大胸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唐代寒食清明节的狂欢色彩

马荣良

苏联学者巴赫金曾说，中世纪欧洲的狂欢节是非官方的和非宗教的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在这里，人们超越的欲望可以得到暂时的表达和发泄，已确立的等级秩序被片刻地颠覆，被禁止的快乐可以暂时地放纵。从巴赫金对狂欢文化的定义来看，唐代的寒食清明节（在唐代，清明节属于寒食节的组成部分）无疑也具有类似的属性。

众所周知，在唐代前期，城市中的宵禁制度极为严格。平常之日，夜鼓之后，市坊闭门，百姓不许在街道上行动。据《太平广记》记载，天宝十二年（753年）冬，住在长安布政坊的张无是“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越桥下而踰”，直到“鼓动”后夜禁解除，他才得以回家。张妻见丈夫不归，一晚上诵经不眠，担心他因“犯夜”被惩处。宵禁之严由此可见一斑。通常来说，一年中只有正月十五前后几夜，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若违犯宵禁，就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唐律疏议》载，如果坊门皆闭，禁止夜行之后还强行

外出，则“笞二十”。

然而，在寒食清明节，洛阳民众却不断违犯宵禁令，掀起一股踏青郊游的热潮。唐李正封《洛阳清明日雨霁》诗云：“晓日清明天，夜来嵩少雨。千门尚烟火，九陌无尘土。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诗歌描绘的是某个清明日，雨过天晴，洛阳城中到处纤尘不染，清新明丽。春风吹拂着河桥，游人在河边桥上推杯换盏，啜饮美酒。黄昏时城里击鼓戒严，但游人却耽于踏青，全然不顾忌戒严的鼓声。“千门万户掩斜晖，绣纛金銮晚未归。”（皮日休《洛中寒食二首》其一）出城踏青游玩者亦流连忘返，至晚不归。“良辰更重宜三月，能成昼夜芳菲节。春风时，百级红紫斗芳菲，良辰美景岂可辜负？“今夜无明月作灯，街衢游赏何曾歇。”洛阳民众白天赏玩犹嫌不足，还要以明月作灯，夜游街衢，以畅其怀，快其意。乘车马出城夜赴龙门游赏者也是络绎不绝，“南有龙门对洛城，车马倾都满路行。”“纵使遨游今日罢，明朝尚自有清明。”（以上诗句见

王冷然《寒食篇》）一城之狂欢如斯。

此外，民众扫墓时的宴饮作乐之举也呈现出浓郁的狂欢色彩。拜扫坟墓，祭奠先人，理应悲感肃穆，但“一代唐人毕竟风流，他们并没有让拜扫的一阵悲恸冲散纵情享乐的兴会雅致，在普遍意识中，仍将寒食清明看作愉快的节令，心底奔涌着欢乐的激流”，早在初唐时期的寒食节，民间上墓活动就出现了“复为欢乐，坐对松楸，曾无戚容”的情况。此风愈演愈烈，至唐高宗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龙朔二年（662年），唐高宗颁布诏令予以禁断：“仍令州县捉搦，勿使更然。”（《唐大诏令集》），但效果并不佳，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娱乐热情。盛唐时此风愈加盛行，“又凡庶之中，情理多阙……及寒食上墓之时，亦便为宴乐。在于风俗，岂成礼教！”（《册府元龟》）对于此种有悖礼教的做法，唐玄宗自然也不能容忍，先后几次下诏予以禁断。开元二十年（732年）四月，唐玄宗在允许寒食上墓的敕令中明确规定“不得作乐”。（《唐会要》）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丁酉，唐玄宗又颁布诏令予以重申：“自

今已后，其缘葬事有不依礼法者，委所由州县并左右街使严加捉搦，一切禁断。其有犯者，官人殿黜，白身人所在决一顿。”（《册府元龟》）惩处可谓严厉，但其成效亦可想见。

不仅如此，寒食节的宫廷杂戏表演也出现了狂欢化的倾向。据《旧唐书·文宗纪下》载，大和六年（832年）寒食节，唐文宗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亟命驱出。”寒食节赐宴之时，在庄严肃肃之地麟德殿——唐德宗以后诸君王举行御前会议的专门地点，竟然有杂戏人弄孔子来取悦君臣。杂戏人究竟搬演什么剧目而使文宗龙颜不悦，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将艺人驱除出去的举动来看，这次演出对孔子的侮渎无疑使统治者不能容忍。实际上，受宫廷中讲经论难之风影响，这种弄孔子之伎恐早已戏侮有加，谐谑无忌。专情此业的杂戏人显然上下皆知，不避忌讳，因而才敢在节日赐宴时调弄。杂戏人弄孔子于宫廷内宴中演出，以供侍觞取乐，则民间弄孔子必极盛行，恣意嘲讽戏弄，亦较之烈矣。

节日的狂欢给唐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暂时从繁重的劳动和琐事中解脱出来，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如意，暂时抛开现实中官民分野、利害冲突，在节日喜庆所缔造的有限时空和文化氛围中，尽情地享受他们平日所不可能享受的一切。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唐代民众而言，祭祀之际的欢腾只是他们“无穷劳碌的间歇，沉重跋涉的小憩，过量付出的些许补偿”。不过是为疲惫的身心造设一片仅供暂栖的绿荫而已。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魏国夫人游春图》(局部，宋摹本)

时光带不走的故事

——《衡水迎宾馆志》辑佚

缴世忠

《衡水迎宾馆志》(以下简称《宾馆志》)是一部商贸服务类专业志书，该书由常海成、张纯宏两位老师主编，修志者拼搏12个月成志。

言简意赅，是中国史志文化的优良传统。《山海经》《禹贡》《战国策》《左传》《越绝书》等史志典籍，均以精练简洁的语言蕴含了海量的自然和人文学识。即便《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也都浓缩了大量育人励志的历史典故和人生哲理。

当前，一些综合性县级志书或省、市级分志，由于受“夹述夹议、策论式、展望式、揭示规律、彰明因果”等非客观如实记事倾向的影响，把一些议论评说、总结、定性等等与史实无关的官套空话夹杂在志书中，虽然膨胀了篇幅，但是可信、可采、可用资料则不够多。

《宾馆志》编纂人员深谙中国史志文化真谛，认识到志书行文记事精练简洁，“叙事之志，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传》宋华耦来盟……此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此省字也。”粗略测算，《宾馆志》的48万字中，记事文字约有30万字，其余均属地图、图片版面。60年的奋斗历程、几代人可歌

可颂的动人事迹，在《宾馆志》编修人员手下浓缩为30万字，年均仅5000字，如此简约的语言文字量，若不具备深厚著述功力是难能做到的。《宾馆志》行文记事精练简洁、言简意赅、文约事丰之笔通篇可见，仅举一例：衡水迎宾馆60年的历程，经历了千辛万苦，与时俱进。《宾馆志·大事记》严格遴选历年大事，非事关迎宾馆重要发展节点和涉及市、省以至国家的大事则不予选载。经过仔细认真筛选，选载了61年(比正文记事多出了2022年)136条大事，约6500字。最多的年份7条，一般年份1至4条，还有6个年份无大事选载。年均大事2.23条，平均每条48个字。条条简明扼要，清晰地勾勒出迎宾馆61年艰苦奋斗的发展脉络。这正是那些大事记条目不严格掌握“大”的标准，巨细皆收，以致志书繁杂冗长的编纂单位应虚心学习的成功经验。

清代方志大师章学诚主张，地方志“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虚誉人耳目者……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事也。”作为科学、严谨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而“地方

志不是评论历史的书，不是史论，多条评论不但为地方志增光，反而为地方志减色。”

《宾馆志》编纂人员通晓修志要据事直书、不事浮文虚誉的古训，遵循不信笔评论、不加点性论说的原则，坚持“记述事物、事件和人物，客观点于记述之中”的原则，把“排查”式采集而来的第一手资料，细心遴选，如史著述志书之中，而不作浅薄的品评、渲染、议论和定性。

通读《宾馆志》，从序言位置的署名文章《时光带不走的故事》、志首《概述》，到全志行文记事，直至志末《后记》，找不到任何定性式的议论评说，而是严格秉持“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志笔，即坚持“用事实说话，不以说话顶替事实”的基本原则。整部志书以质朴无华的语言，堂堂正正的笔调，如实记述了衡水迎宾馆60年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难而高速的发展。

开篇第一章记述的1963年至2020年经衡水地、市党委和政府(行署)正式任命的历届招待处长和党组书记，明显的寓意此企业的公有制属性，企业领导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任命，而建立了党组织的私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可能由当地党委选派，也可能由已经入党的企业经理或厂长兼任，但是其经理或厂长职务不是由当地党委、政府任命，而是注册承认或由股东推选。继而记述企业由最初7排40多间低矮的平房、几十张简易床铺而创业到2021年成为衡水市区标志性建筑；由最初的25名员工增加到600多名服务、技术、管理人员；由最初20年不以营业收入为目标的接待服务管理，到实现营业收入由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再到几千万元的三次大跨越。



《千年运河润京城》

“一河越千载，一河览古今”，大运河作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文化带不仅被列入北京全国文化中心“一城三带”建设之中，同时被列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日前，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北京文化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组织编写的《千年运河润京城》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全书通过呈现大运河文化带所形成的各类文化资源，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文脉传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全书上下两册，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从整体上概括了大运河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其余七章，将大运河的文化资源分为河道、闸桥、沿线庙宇、码头、粮仓、公园与博物馆、乡情民俗七个版块分别进行了介绍。全书从大运河沿线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摘取了40余种进行了重点撰写，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缘起、变迁与现状，并将它们与现有的旅游资源加以结合，是一本鉴古通今的文化随笔。

(文宗)

